

# 抗美援朝战争与我军现代化建设

● 李德才 陈 飞

**摘要:**以劣胜优的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在上世界上软弱可欺的形象,而且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即我军要建设成为现代化军队,就应加快新军兵种建设,不断提高人民军队一体化作战能力;应大力加强武器装备建设,不断提高人民军队实施现代战争的能力;应积极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人民军队的科学文化水平。只有这样,我军才能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关键词:**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队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E297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1)04-0051-06

**作者:**李德才,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陈 飞,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赢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这场以劣胜优的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在上世界上那种软弱可欺的形象,向全世界人民展现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所焕发出来的自豪、自信和自尊,而且也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积累了极其重要的宝贵经验。

## 一、要建设现代化军队,人民解放军就应加快新军兵种建设,不断提高人民军队一体化作战能力

抗美援朝战争前,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军很长时期内处于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中,武器装备主要靠战场上取之于敌,这就造成了我军武器装备的简陋混杂和性能单一(主要是枪和炮),使我军直到解放战争后期基本上还是一支单一步兵型的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倚仗其空军和海军的巨大优势,掌握着整个朝鲜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是扎扎实实的现代化的全方位立体战争;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主体是单一的步兵,加上部分炮兵和很少的装甲兵协同作战,与健全的陆军尚有很大差距,也没有海军直接参战。虽然在战争后期志愿军空军参战,装备了少量当时较为先进的米格-15战斗机,但主要是用于后方掩护,不能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兵种构成,决定了志愿军进行的是以单一步兵为主体的极其简陋的平面战争,这显然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由此给志愿军带来四个严峻的挑战<sup>①</sup>:一是造成志愿军防空的极大压力。在朝鲜战争中,美军利用强大的空中优势进行狂轰滥炸,其轰炸密度史无前例。因此,志愿军在整个战场上,不论前方还是后方,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必须时刻注意防敌空袭,稍有疏忽,就会遭到惨重损失。如1950年11月5日拂晓,第38军第112师指挥所在美军空袭中牺牲团级军官4人、营级军官10人、连级军官18人、排级军官36人、战士129人,伤75人,共计伤亡272人。另有汽车4辆、电台和总机各1部被毁。在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遭到美军空袭的志愿军师、团两级指挥所就有8个,其中有5名师长、师政委被炸伤。志愿军的全部行动均在美空军的严重威胁之下,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整个作战体系的正常运转。二是大大制约了志愿军昼间的行动自由。由于志愿军没有空中支援,又严重缺少防空武器。特别是前三次战役,志愿军防空部队总共只有1个高炮团36门高炮,每个步兵军也只

有十几挺高射机枪,防空力量极其薄弱。美空军不但攻击我固定目标,而且攻击我活动目标;不但攻击我方车队和运动中的部队,而且有时甚至攻击单个车辆和行人。由于制空权缺失,志愿军昼间行动受到很大制约,一般只能夜攻昼防,昼间难以调动部队向纵深发展,痛失了许多战机,志愿军作战能力受到了严重制约。三是造成志愿军作战物资补给异常困难。志愿军的作战物资补给几乎全部要从我国境内运输,但只能靠陆路运输。而运输汽车数量严重不足,道路交通在美机轰炸之下变得非常艰难,造成了国内物资堆积,而前方运量却远远达不到作战需要。在前三次战役时粮食供应只能保证四分之一,第四和第五次战役也只能保证一半,弹药只能做到重点补给,而作战中的跟进保障更加艰难。保障的艰难状况往往影响到指挥员的作战决心和取得更大的战果。四是使得志愿军减员增大,影响作战力量的保持。具有联合作战能力的美军,机动能力和火力都很强大,给志愿军带来较大的伤亡。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较量中,双方作战减员的总对比为1:5.3。而在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双方作战减员对比上升为1:1.23。据统计,中朝军队作战伤亡70%—80%为美军炮火所致,7%—8%为美空军轰炸所致。志愿军部队作战减员大,无法及时补充,因而影响了战斗力的保持。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了有效遏制敌人的优势,达成战争目的,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屋建瓴,果断决策,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加强人民军队军兵种建设,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人民军队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的历史性跨越。采取的主要战略性措施有:一是建立了一支现代化人民空军部队。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党中央调整了组建航空兵部队的计划。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配齐了空军部队所需要的12个师部、49个团机构,并向苏联订购586架各型飞机。组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一批、第二批部队。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初,空军边打边建,共组建了28个航空兵师70个航空兵团,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建成了一支由各种航空兵组成的有较强战斗力的空中力量,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拥有现代装备的强大空军力量的国家之一。二是建立了现代化装备的多兵种部队。志愿军刚入朝时,参战兵种是以步兵为主体的单一陆军,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和摩托化装备,防空和反坦克武器也很少,一个军的无线通信机和有线电话机仅相当于美军一个师同类装备的5%和34%。从1951年春季开始,中国军队逐步实现了全面现代化改装,其中完全按照苏军编制装备或组建的有:56个步兵师,6个坦克师和独立坦克团,101个独立高射炮营,5个野战高炮师和1个城防高炮师,2个火箭炮师,14个榴弹炮师,2个反坦克炮师,33个高射炮团,4个探照灯团,9个雷达团和独立雷达营,28个工兵团,10个铁道兵师,以及通信兵和防化兵部队。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中国已经建立了具有现代化装备和作战能力的多兵种部队。正如朱德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4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的:“我们的军队现在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新式装备,已经组成了各个兵种,我们将要进一步加强这些兵种。人民解放军将由过去单纯的陆军,而且基本上是依靠步兵作战,过渡到具有各种现代技术装备的陆海空军,可以在抵抗敌人侵略时进行各兵种的联合作战。这在我们的建军史上,是一次大的历史性的转变。”<sup>②</sup>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告诉我们,要想以最小代价赢得现代化的反侵略战争,就必须有现代化的军队。而建设现代化军队,就应着眼信息化战争要求,大力推进军队一体化建设,增强军队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胡锦涛指出:“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发展,必须注重解决体制机制上制约军队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经过这些年的调整改革,我军在压缩规模、优化结构、理顺关系、完善政策制度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随着战争形态由机械化向信息化加速转变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军队建设中一些体制机制上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步伐,着力推进军事组织体制创新和军事管理创新。要深化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的调整改革,进一步转变领导管理方式,为军队建设的科学发展提供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保证。要适应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需要,建立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联合联训体制和联合保障体制,优化力量结构和部队编成。”<sup>③</sup>胡锦涛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一体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一是进一步优化军兵种总体结构,即适应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的特点

和各军兵种的任务要求,贯彻“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则,把着力点放在优化军兵种结构、理顺关系、构建体系、提高效能上,使军队内部结构相互协调,功能相互补充。应提高各军兵种高新技术部队的比例,谋求作战力量结构协调发展,进一步充实作战力量,在精简陆军、加快陆军转型的同时,减少装备技术落后的一般部队,加强海、空军和第二炮兵建设,加强信息作战和航天力量建设,以适应未来空天作战的迫切需要。应通过优化军兵种总体结构,使我军的组织结构在军种比例关系上进一步优化,使诸军兵种作战力量体系完整、结构合理、比例适当,从整体上构建起立体化、一体化、远中近相互衔接的攻防兼备的作战力量体系,全面提高军队的威慑和实战能力。二是进一步优化军种内部结构。陆军应加快向信息化为主导的机械化转型,缩小规模,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着重提高空地一体突击、精确打击、远程机动、信息对抗、综合保障和特种作战能力。海军应扩大近海防御作战空间和防御纵深,加强、完善海战场建设,在增强第一岛链内近海综合作战能力和核反击能力的同时,提高远海机动作战能力,逐步向远海防卫型转型。空军应适应信息化空中作战要求,逐步实现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提高空中进攻、防空反导、信息对抗、预警侦察、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能力。第二炮兵应按照远中配套、精干有效的原则,不断提高战略威慑和打击能力,不断提高核导弹的突防和快速反应能力、常规导弹的中远程精确打击和综合毁伤能力以及部队的生存能力。三是形成一体化作战力量体系。关键是搞好诸军兵种武器装备的系统集成,实现横向技术一体化,确保能够互通、互联、互操作。这既是一种技术手段,也是一种思想方法,是“系统集成”的集中体现。充分利用先进技术,在确保稳定和保密的前提下,使陆、海、空军和第二炮兵使用共同的软件、标准、规程及通用技术,从横向上对现有武器系统进行信息化改造,使其具备通用性、联动性、自主协调性,从而提高武器打击系统和支援保障系统的整体效能。通过技术运用的横向一体化,把战场上的所有作战系统从横向上联接成为整体,使信息在各个作战单元之间顺畅流动,真正形成诸军兵种一体化的作战力量体系。

## 二、要建设现代化军队,人民解放军就应大力加强武器装备建设, 不断提高人民军队实施现代战争的能力

从武器装备方面来看,抗美援朝战争是现代世界战争史上一场典型的不对称战争。美国拥有强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美军地面部队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和摩托化,机动能力强,具有强大的火力优势。一个师的火力和机动力大大超过志愿军一个军的。美军一个师即拥有坦克 149 辆、装甲车 35 辆、炮 950 门左右,其中 70 毫米以上火炮(含坦克炮)330 余门,火炮口径大、射程远,均有汽车牵引;联络飞机 22 架,各种汽车 3800 余辆;步兵装备的枪支都是自动、半自动化的。志愿军地面部队没有机械化和摩托化装备,主要是持轻武器的步兵,炮兵也不多,没有装甲车,初期也没有坦克,后期只有部分坦克参战。志愿军一个军才装备各种火炮(包括火箭筒)520 余门,仅相当于美军一个师火炮数量的 54%。其中 70 毫米口径以上火炮 190 余门,只相当于美军一个师相同口径火炮数量的 57%,并且非常陈旧,型号杂、口径小、射程近、弹药不足,多由骡马驮载或由人员携行。每个军入朝时只临时配属了运输汽车 100 辆,坦克在后期才编配。志愿军步兵枪支是“万国牌”,美制、俄制、德制、日制和旧中国制造的都有,且只有 50%左右是自动、半自动枪支,到战争后期才统一装备了苏制枪支。美军通信设备和战场侦察手段先进,指挥联络通畅、灵敏。战争期间,美国连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国家军队在内,投入到战场上的坦克最少时 880 余辆,最多时 1540 余辆;各种火炮最少时 1.08 余万门,最多时 1.61 余万门;飞机最少时 1100 余架,最多时达 2400 余架;各种舰、船、艇最少时 110 余艘,最多时达 300 余艘。在朝鲜战争上,美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所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曾任志愿军司令员的邓华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时指出,这场战争证明,“现代战争一定要有必需的现代技术装备。没有必需的火炮,既不能摧毁敌人的坚固阵地,也不能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没有坦克和反坦克武器,便不能击毁敌人的坦克;没有空军和防空武器,便不能打击敌人的空军,掩护自己的战场。”<sup>④</sup>

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准备阶段,中央军委就注意到,志愿军同拥有高度现代化技术装备的美军作

战,没有一定数量的现代化技术装备是不行的,并且把这一问题作为制定作战方针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正如彭德怀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的1950年10月16日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所强调的:“根据敌情和地形条件,过去我们在国内所采取的运动战,大踏步地前进和大踏步地后退,不一定适合朝鲜战场。因为朝鲜地面狭小,敌人暂时还占某些优势,所以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配合。”<sup>⑤</sup>战争初期,志愿军虽然依靠兵力、政治上的优势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由于受技术装备条件的限制,没有海军和空军参战,坦克、火炮也很少,再加上通信技术和侦察手段相当落后,使得志愿军作战效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以致未能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志愿军不易达成战役合围。第三次战役后,志愿军包围“联合国军”重兵集团比较困难。因为此时战争双方已形成连贯的战线,欲实施战役包围必先实施突破。由于志愿军装备差,突破火力弱,因此有时突破就不够顺利,待经过努力突破后,“联合国军”主力已跑掉;有时虽成功突破,但迂回部队徒步穿插到位时,“联合国军”已凭借其摩托化装备乘隙逃离包围圈。如第三次战役时,志愿军计划以6个军分左右两个纵队,在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配合下,共歼南朝鲜军3个师。虽然志愿军各军突破南朝鲜军防线较为顺利,但因没有摩托化装备,担任战役穿插迂回的部队全靠徒步行进,结果南朝鲜的2个师在志愿军尚未完成合围或刚刚达到合围位置时南逃。二是即使达成对美军的战役战术包围也难以聚歼。志愿军对南朝鲜军达成战役战术合围后基本能够全歼和大部歼灭,但很难聚歼包围的美军。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如在第二次战役中的西线战场,志愿军充分利用战略和战役上的突然性,迅速包围和歼灭南朝鲜军第7、第8师大部,在“联合国军”进攻的右翼打开战役缺口,成功截断了美第9军南撤的退路,将美第9军指挥的美第2师、第25师和土耳其旅全部,美骑兵第1师和南朝鲜第1师各一部,三面包围于清川江以北地区,但难以全部吃掉,甚为可惜。事实证明,政治上的优势和兵力上的雄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装备方面的不足,但不能取代技术装备的作用。因此,毛泽东强调:“无论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如何,都要搞国防工业建设与军工生产。朝鲜战争证明,已不能靠夺取敌人的装备来武装自己了。”<sup>⑥</sup>他明确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sup>⑦</sup>为了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尽快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党和政府在国家经济还很困难、各方面都需要发展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军工生产,显著地提升了我军的武器装备水平。这些成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得到了体现:第四次战役时,我军出动了坦克,增加了反坦克武器,使敌坦克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横冲直撞了。第五次战役后,我军防空武器逐渐增加。随后,我空军入朝参战,在我高炮的配合下,夺取了清川江以北一定时间和空间的制空权,对保障战略和战役后方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我军采取积极防空方法,利用各种火器打飞机,使敌飞机的损失逐渐增加,减弱了敌人空中的优势,从而使我军汽车损失和人员伤亡大大减少。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的力量只有通过物质力量才能摧毁,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抗美援朝战争对此给予了最有力的证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变革风起云涌,胡锦涛指出:“提高军队的科学技术含量,加强以信息化为主要标志的军队质量建设,成为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过去那种单纯依靠增加人员规模和一般技术武器装备数量来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模式已经不适应信息化战争的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实施科技强军战略,推进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sup>⑧</sup>。要“围绕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进一步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要努力提高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发展的自主创新能力,切实增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能力,力争在一些基础性、前沿性、战略性技术领域获得重大突破,推动我军高技术武器装备的自主式发展、跨越式发展、可持续发展。”<sup>⑨</sup>为推进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应对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挑战,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对军事信息技术、军事新材料新能源技术、军事航天技术、军事生物技术等技术的创新研究,为我军武器装备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事实上,上述高技术的相互融合与发展,直接带动了精确制导技术、遥感和探测技术、卫星通信技术、导弹预警技术、全球定位导航技术、隐身技术、激光

技术、夜视技术、电子对抗技术、军事生化技术等一系列现代军事高技术群的出现,催生了一系列的高技术武器装备。信息技术以实现信息的获取、传递、处理、利用等功能为目的,现已发展成为集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传感器技术、控制技术、多媒体技术等为一体的综合技术群;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了人类染色体30亿个碱基对的DNA测序,为研制威慑力和杀伤力巨大的人类基因武器提供了可能,军用生物技术扩展了传统生化武器的作用机理,新型生物战剂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空间态势感知已成为军事航天技术新的发展领域,空间攻防技术发展取得突破,针对卫星平台、有效载荷和星间或星地链路实施各种软硬杀伤的新概念、新技术不断涌现,地基反卫技术逐步成熟,地基动能、激光和微波反卫武器进入初步实际应用阶段。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必须把信息技术创新作为军事技术创新的核心,给予特别的重视,下大力尽快实现国防科技的发展,并以此为基础,研发出更为先进的指挥信息系统、更大威力的“杀手锏”等武器装备,为打赢信息化战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 三、要建设现代化军队,人民解放军就应积极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不断提高人民军队的科学文化水平

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在一定意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人才队伍建设的伟大胜利。但面对抗美援朝这种全新的作战,一些志愿军指挥员缺乏必要的现代战争知识,对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现代武器装备的性能和作战运用特点缺乏了解,缺乏指挥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如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结束后,组织部队向后转移时,由于对美军以其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组成的特遣队迅速跟踪穿插渗透的特点没有引起高度重视,致使整个部队转移部署不够周密,在留下掩护的部队尚未完全展开就位时,主力即行后撤,造成战役空隙,使敌军有隙可乘。特别是个别部队在被敌人包围后,未能很好查明情况,集中全力从敌人间隙中坚决突围,而是采取了分散突围的办法,以致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损失。志愿军协同作战水平的提高,经历了一个不断实践、学习的过程。在初期的运动战阶段,志愿军的专业技术兵种比较少,炮兵的机动性不强,因而未能与步兵很好协同。进入阵地战阶段后,随着我军装备的不断改善,炮兵、工兵都大大加强,坦克兵也开始参战,依托既设阵地的作战行动日益复杂,从而要求有效组织协同作战。1951年11月,志愿军对马良山、正洞西山等地的反击战,首次成功地实施了步、炮、坦、工兵和高射炮兵的协同作战。应该说,这次协同作战在总体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也存在着协同意识不强、协同动作不够一致以及个别兵种和单位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情况。之后,志愿军的协同作战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在1953年夏季的金城反击战中,比较圆满地实施了兵团级规模的现代诸兵种协同作战。同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缺乏必要的专业技术人才,因此,对缴获的敌军现代技术装备不能充分利用,缺乏对战场武器装备和通信设备的有效维护。正是这种专门技术人才的缺乏,使我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难以提供顺畅的通信保障。

结合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经验,为推进我军现代化建设,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培养军事人才。一是在全军普遍开展文化教育,全面提高部队官兵的文化素质。1951年11月,中央军委在关于下年度军事训练的指示中要求:“全军除海、空军及雷达部队之有文化者,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这一方针,是为了更有准备和更有步骤地执行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计划和掌握现代技术。”<sup>⑩</sup>经过系统的文化教育,全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全军原来80%的干部战士是文盲和初小文化程度,到1953年,普遍达到初小文化程度,干部绝大多数达到高小毕业或初中文化程度。文化教育对我军指战员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提高军政素质以及综合能力具有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二是创办各类军事院校,大力培养现代军事人才。为加紧培养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军事人才,我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创建了一批军事院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为当时和后来的军队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急需的各类人才。1953年9月,我军第一所正规的高等工程技术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建成开学。毛泽东在给该院的训词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

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sup>①</sup>这个训词非常深刻和清晰地反映了人民解放军创办军事院校、培养军事人才的主旨。三是通过实战,培养军事人才,提高部队现代化作战的能力。通过战争实践培养军事人才,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的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sup>②</sup>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了锻炼部队,培养人才,中央军委采取了轮番作战的方针,有计划地组织部队轮番作战,先后抽调27个野战军轮流到朝鲜参战,接受战争的锻炼与考验。毛泽东强调:“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院校好。”<sup>③</sup>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人民解放军官兵的科学文化素质有了明显的改善,军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有效地提高。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告诉我们,军队的基础在人,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也在人。在任何条件下,武器装备的功能都是人赋予并最终由人来实现的,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依然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需要指出的是,在信息化条件下,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大量运用,使得军事对抗正在从物理域向信息域、认知域拓展,成为在陆海空天有形战场和电磁空间、认知领域等无形战场同时展开的较量。同时,随着军队的技术构成越来越复杂、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新的对抗手段和方法也层出不穷,对抗日益呈现知识与技术密集的特征,军队越来越成为“科技密集型”的武装集团。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成为战斗力的基本形态,人的科技素质在战斗力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sup>④</sup>打赢信息化战争,对人的素质特别是人的科技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提高当代军人的素质特别是科技素质对战斗力生成和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必须“努力造就大批适应军队信息化建设、胜任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任务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sup>⑤</sup>在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强调:“我军官兵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优良的思想作风和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但官兵素质结构中军事技术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偏低,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不足,特别是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紧缺,已经成为影响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sup>⑥</sup>胡锦涛这一重要论述提醒我们,在我军武器装备与强敌相比总体上还比较落后、官兵的科技素质还比较低、各级干部指挥高技术战争能力还不够强的情况下,更要注意提高人的全面素质,加强军事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军事人才。为此,需要采取超常措施,通过机制创新,进一步完善军事人才建设的机制,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广纳群贤、人尽其才的用人机制,建立和完善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培训机制,建立和完善进出顺畅、流动有序的调控机制,建立和完善吸引人才、保留人才的激励机制,激发、调动各级各类军事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

#### 注释:

- ① 郭志刚、李新民:《钢少气多——武器装备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深刻影响及其启示》,《军事历史》2005年第10期。
-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405页。
- ③⑧⑨⑭⑮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读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255页、第210页、第254页、第210页、第211页、第201页。
- ④ 邓华:《论抗美援朝战争的作战指导》,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 ⑤ 齐德学:《〈真相〉一文所讲的是真相吗?》,《中国军事科学》2000年第4期。
- ⑥ 《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 ⑦⑩⑬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1页、第351页、第316页。
- ⑩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19页。
- ⑫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责任编辑 魏延秋)